

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及其考古标识和 相关问题试析*

何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统称。商品经济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为简单商品经济或称小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高级阶段为市场经济，市场成为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1]。从考古的角度说，“贸易是原状或加工过的自然资源进行空间移动的一种必要方式，而贸易在考古学上加以辨认的一种方法是对开发原料的地点或货物制造的地点或两者一起的寻认而将这项移动加以追踪。^[2]”

我曾经撰文分析长江流域史前商品经济文明化模式，认为史前时期的商品经济的文化选择，不一定只是个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史前时期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3]。

其实在传统认为商品贸易极度受限的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也曾经存在过比较发达的小商品经济，只是我们以往对其认识和重视不够。本文试图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商品经济现象的考古遗存，则其明显者，稍作分析。

一、黄河流域史前商贸中心的案例试举

1. 磁山遗址分析

黄河流域早在 7000~8000 年前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产生出了商贸中心聚落。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掘面积 2579 平方米，清理灰坑 476 个^[4]，佟伟华先生分析统计粮食窖穴 88 个。她粗略计算 88 个窖穴总容积约 109 立方米，可装粟米十万斤以上^[5]。磁山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陶盂（图一）。二期石磨盘 52 件，石磨棒 50 件，残石磨棒 183 件。尽管近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尤其是磁山文化石磨盘和石磨棒科学检测显然，磁山文化石磨盘处理植物种子是多样化的，包括加工粟、黍、野生植物橡子、禾本科、豆科、块茎等^[6]，但是结合磁山遗址存在较多的粟黍窖穴，我仍然认为磁山遗址出土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6-68.

[2] 张光直.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C]//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70.

[3] 何弩.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商品经济模式新探[J].东南文化,2014(1):53-64.

[4] a.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981(3).

b.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J].考古,1977(6).

[5]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J].农业考古,19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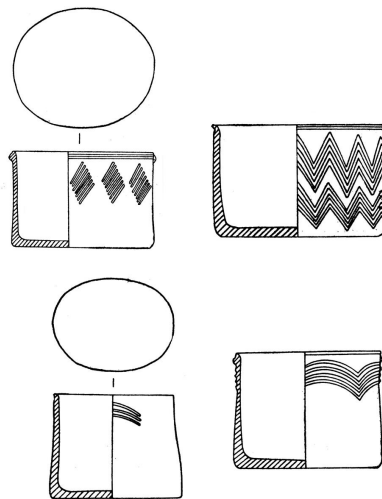
[6] a.刘莉,陈星灿,石金鸣.山西武乡县牛鼻子湾石磨盘、磨棒的微痕与残留物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4(3):109-118.

b.Liu Li, Judith Field, Richard Fullagar, Sheahan Bestel, Xiaolin Ma, and Xingcan Chen, *What Did Grinding Stone? New light on Early Neolithic subsistence economy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Valley, China* [J]. *Antiquity*. 2010(84):861-833.

的大量石磨盘和石磨棒，主要用于谷物加工，数量可观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暗示出磁山遗址有较大的粮食加工能力。

葛英会先生认为，磁山遗址是“天下第一粮仓”，出土的陶孟 140 余件，是当时当地统一流行的陶量。葛先生的依据是：1.出土地是粮仓、粮食加工场所与粮仓管理人员住所；2. 与战国以来历代的“嘉量”形制基本一致；3.生活用器多为圆底，燃柴加热受热面积大，器内无死角容易清洗；4.历代陶量多平底筒形，平底可平置，谷物装满时不易自行外溢；筒形容易制作并容易控制容量。葛英会先生进一步认为，磁山遗址是史前的仓廩遗址，暗示仓廩是政府管理行为，因此不仅陶孟是磁山的标准量器，而且出土的一期的 60 余件陶弹丸与 4 件石弹丸、二期 13 件陶弹丸和 6 件石弹丸，很可能也是仓廩管理的记数工具。一期陶片改制“纺轮”8 件、二期 11 件，穿起来可以帮助记事或数量加减。类似后来的算盘^[7]。

我认为，佟伟华和葛英会二位先生的真知灼见很有道理。这类陶孟的形制数千变化不大，在陕西凤翔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陶桶形器，就是平底筒形，其中标本 05FDAH71：2 和 05FDAG1：147 都刻有“公斗”二字^[8]，明确这类桶形器是量器。



图一 磁山遗址出土部分陶量（孟）

磁山遗址粮食窖穴废弃堆积中常见草拌泥红烧土块，这实际上就是原来粮仓顶盖的苫的草拌泥层，失火后成为红烧土。因此粮食窖穴为仓廩说是有根据的。磁山遗址出土的弹丸和“纺轮”更像西亚地区商品交易记账用“陶筹”^[9]，因此作为记数的工具更有道理。西亚地区陶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范例（图二）。“陶筹形体小。可塑性强，可模仿物体造型，亦可模仿生物造型，还可以在其表面刻上各种纹饰，变化多端，以致无穷。据史蔓特-白瑟拉特的不完全统计，以不同形制和纹饰为界，陶筹类型多达 500 余种。以‘圆盘’为例，仅纹饰就有 30 余种。^[10]”陶筹的功能主要用于计算商品货物或记账。所谓“圆盘”陶筹，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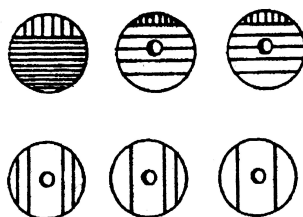
^[7] 葛英会.天下第一粮仓的陶量[J].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 48 期), 2011(3):1-2.

^[8] 陕西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博物馆:《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 4 期. 3~31 页。

^[9] 拱玉书, 颜海英.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192.

^[10] 拱玉书, 颜海英.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191 页。

上与我们所谓的“陶纺轮”没有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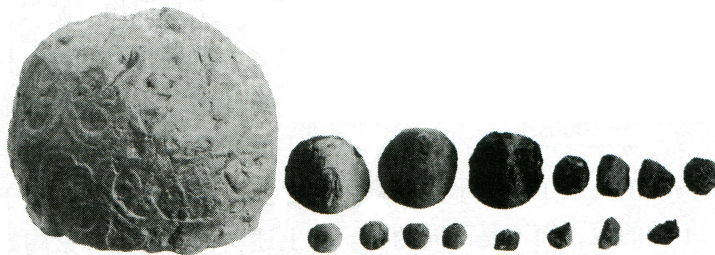
图二 西亚出土圆片形陶筹

我还注意到磁山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陶器，均为模仿大型陶器制作，不似实用之物，复原数量较多，器类有四足器、小支脚、小盂、小深腹罐、小杯、小长颈罐、小三足杯、小盆等，对比西亚地区贸易商品记账的小型器物模型，我称之为“实物符号”^[11]或“实物立体符号”^[12]。西亚乌鲁克遗址曾出土一个陶封球，内容六个草具“油罐”形状的小陶筹^[13]（图三）。磁山遗址出土的制作粗糙的迷你陶器，就很有可能是这类功能。



图三 乌鲁克出土陶封球及其小陶筹（引自拱玉书，颜海英：《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图 86）

西亚苏萨遗址曾出土一个陶封球，内容 15 个球状或大颗粒状陶筹^[14]（图四）。而磁山遗址也出土了 80 余件“弹丸”，实际上也是记数用的陶筹或石筹。磁山二期 T27②层出土的 2 件锥状穿孔器，原报告称为“小陶饰^[15]”，也应是陶筹的一种。



图四 苏萨出土陶封球及其小陶筹（引自拱玉书，颜海英：《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图 87）。

[11] 何弩.符号系统考古的理论试探[C]//考古学集刊(第 18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243~244 页。

[12] 何弩.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J].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 54 期), 2012(9):18-34.

[13] 拱玉书, 颜海英.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192.

[14] 拱玉书, 颜海英.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192.

[1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981(3):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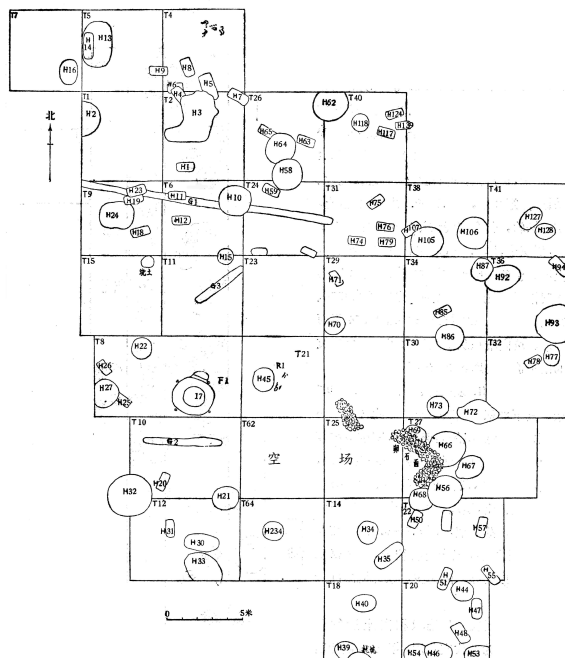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磁山遗址一期的 H32 出土陶量（盂）3、陶支脚 2、弹丸式陶筹一堆近 40 个。H32 以东的 I 区 T62、T25、T14、T21 是一片相对空白的空场，有卵石面建筑遗迹（图五）。卵石面建筑遗迹内侧即西侧第②层中，出土 5 组石磨盘、石磨棒、陶量、陶支脚组合遗物堆。我怀疑是交易市场摊位所在，一边加工一边用陶量交易。H32 出土陶量和陶筹用于粮食交易，便在情理之中。同样，III 区的 T87 和 T92、T96 和 T99、T110 周围^[16]，均有可能是交易的摊位（图五）。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磁山遗址拥有储量达十万斤的粮仓，农业理应非常发达，足以养活规模不大的磁山遗址上居住的居民。然而，磁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野生动物占 50% 以上^[17]，还有大量的朴树子、山胡桃，骨器中镞、鱼镖、网梭的发现，都表明似乎磁山遗址渔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磁山遗址还出土了超过该遗址人口规模使用量的石器，仅完整和残半的石斧就有 1758 件，石铲 79 件^[18]。

据此我认为，磁山遗址是 8000 年前的一处商业贸易中心遗址，面积不大，但是从事粮食（粟）加工贸易、石器加工、采集狩猎收获物的交易，商品市场的地位十分重要。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看，磁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南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关系密切，北与兴隆沟文化关系密切，于是磁山遗址很可能是北部的兴隆沟文化与南部的后岗类型之间的交易中心，以至于小小的磁山遗址却聚集了农业、石器工业、渔猎经济的巨大财富。



图五 磁山遗址遗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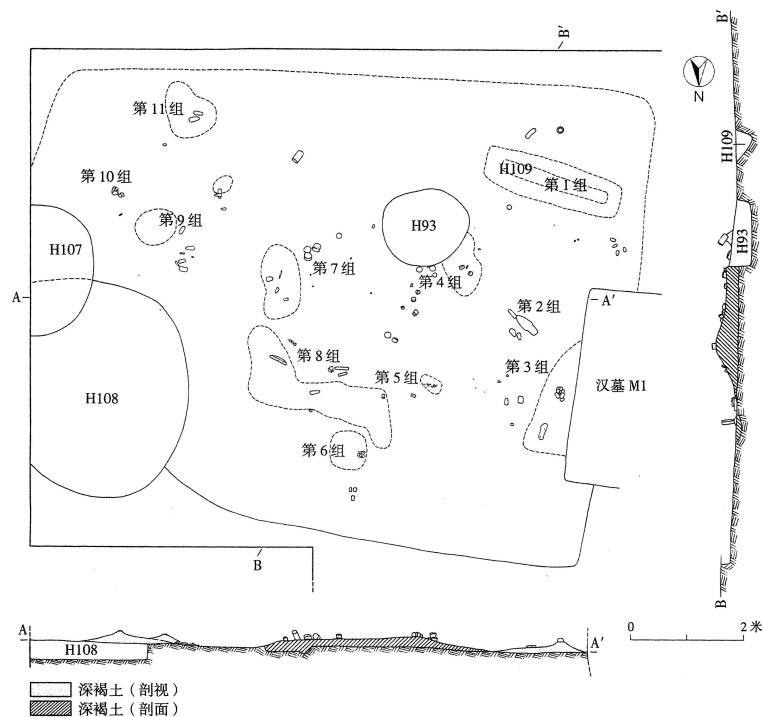
[16]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981(3):335-336.

[17] 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J].考古学报,1981(3):339-347.

[18]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J].农业考古,1984(1).

2. 北福地遗址分析

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时代和考古学文化面貌与磁山遗址大体一致，距今约 8000 年。遗址面积仅 3000 平方米左右，出土遗迹遗物却十分丰富^[19]。



图六 北福地村北高台市场（祭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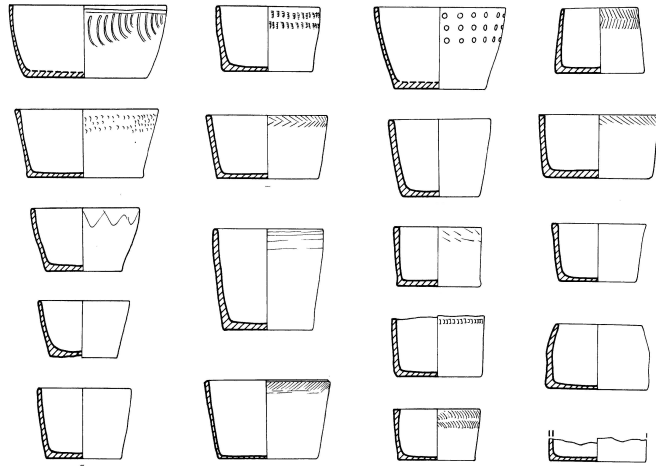
原报告称遗址高台部位有一片“祭祀场”，将生土地面稍加平整，上面铺垫深褐土形成台面，面积大约 100 平方米左右，大致呈东西长方形。台面上残留着摆放的器物 91 件，根据摆放的空间关系大致可分为 11 组相对集中的器物群(图六)。各群器物的组合模式不尽相同，有石器组合、陶器组合、石器（包括玉器）与陶器组合三大类。

石器绝大多数为实用器，以斧、铲为主，分别出土 16 件和 12 件。一件石耜巨大，可称为 8000 年前的石耜王 (J:11)。

陶器共计出土 35 件。多数为小型模型器物 (miniatures), 应当是商品交易用陶筹。陶器以陶量 (原报告称“直腹盆”) 及其模型为主, 尺寸稍大些的 19 件, 可作为实用陶量 (图七); 11 件口径小于 9 厘米的发掘者称为小杯, 可视为陶量模型 (图八)。另有陶片“纺轮”2 件。筒腹罐 2 件, 残陶漏斗 1 件 (图八)。

玉器均为装饰品总计 13 件, 其中玉玦 2、匕形器 1、饰件 2、绿松石饰 4、石雕兽头 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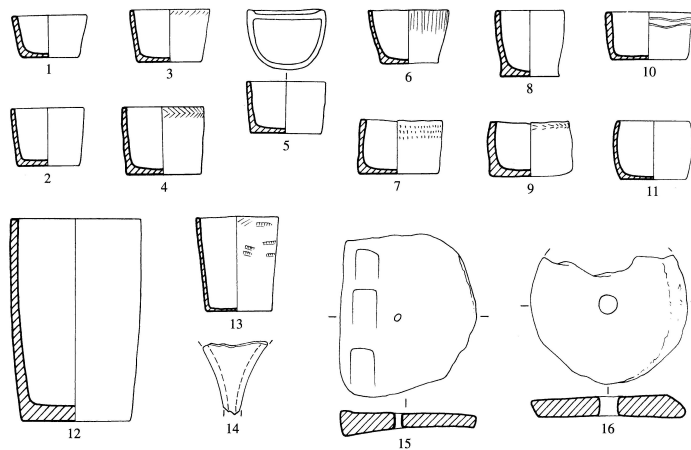
^[1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M]. 段宏振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本文所用北福地考古资料皆引自该报告.



图七 北福地市场现存陶量

北福地“祭祀场”除了比较完整的遗物遗留之外，通过与“宗教礼仪考古标志”^[20]对比，我看不出其祭祀对象是什么？器物组合所反映的行为有何礼仪含义？史前时期，实用的石器多不用于宗教祭祀，模型陶器主要用于下葬“冥器”而不用于祭神，玉装饰品玦和匕都不是重要的玉质宗教艺术品或称玉礼器如璧、琮、璜、龙、凤、鹰等，用于祭祀很不庄重。所以我认为北福地的“祭祀场”功能可以另有解释。我根据磁山遗址市场遗迹的模式，认为北福地的“祭祀场”可以用“交易市场”遗迹来解释。

市场台面上的 11 组器物群可视为 11 个交易的摊位（图六）。石器是基本上都是实际交易的商品，石耜王可能不用来交易，而是由于其体形硕大、制作精良而作为石器商品的“幌子”或招牌，有如现今鞋店橱窗里巨大的皮鞋、筷子点门口摆着的巨大的木筷子（图九），不具有使用的商品价值。陶量模型则与粮食交易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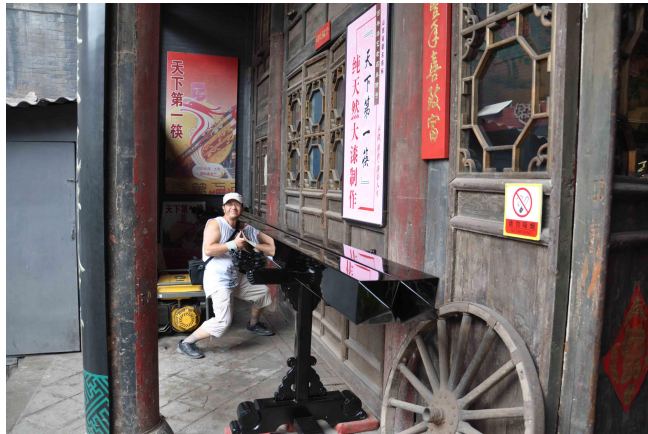


15、16: 0 3厘米 余: 0 10厘米

1. 杯J: 2 2. 杯J: 30 3. 杯J: 33 4. 杯J: 38 5. 杯J: 35 6. 杯J: 40 7. 杯J: 47 8. 杯J: 48 9. 杯J: 64 10. 杯J: 72 11. 杯J: 85 12. 筒形罐J: 73 13. 筒形罐J: 10 14. 漏斗形器J: 25 15. 纺轮J: 21 16. 纺轮J: 69

图八 北福地市场上现存的陶量模型及其他陶器

^[20] 何弩.中国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C]//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222-228.



图九 山西平遥城内筷子店（前店后场式）内的“天下第一筷”

第1组出土陶量模型2、筒形罐1、砾石1、卵形石（网）坠1、玉玦2、水晶块1件。表明是粮食、石器与玉器之间的交换。似以石器和玉器交易为主。

第2组与第3组相距甚近，似合为一组，出土石耒王1、石斧7、石铲3、砾石1、玉玦1、绿松石饰2、陶片算筹1、陶漏斗1件。表明是石器与玉器之间的交换。

第4组位于台面的中央，出土陶量模型13、石刀1、石凿1、石铤1、水晶块1件。表明是粮食与石器和玉料（水晶）之间的交易。其中以粮食为主。

第5组与第8组距离过近，可合为一组。出土石磨盘1、石磨棒2、陶量模型6、陶片算筹（纺轮）1件。表明以粮食交易为主。

第6组出土陶量模型1、石斧3件，表明是粮食与石器之间的交换。似以石器交换为主。

第7组出土陶量模型4、石斧1、石铲3、石铤1、石雕兽头1、玉饰2件，表明是粮食、石器、装饰品之间的交易。看不出以什么交易为主。

第9组出土石斧3、石铲5、石铤1、石凿1、绿松石饰1件，表明是石器与玉质装饰品之间的交易。

第10组出土陶量模型2、玉匕1件。表明粮食与玉器之间的交易。似以粮食交易为主。

第11组出土陶量模型1、石斧1、石铲1件。表明粮食与石器之间的交易。以石器交易为主。

北福地市场中央以第4、第5与8组为中心，以粮食交易为主，围绕其周边的摊位似以石器交易为主。而多数器物组合中都有陶量模型，暗示北福地的交易市场中，粮食很可能成为交换等价物。象征粮食交易的陶量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般等价物实物符号功能——最原始的货币职能。

北福地遗址本身有石器制造场，如 S2。遗址一期的房子内废弃堆积中均包含数量相当可观的石质品。如 F1 出土石质品 2427 件，其中砾石 1503、废料 562、残缺品 77、废品 28、半成品 1、成品 4、细石器 247、石容器残片 4 件。F2 出土 1053 件，其中砾石 44、废料 906、残缺品 57、废品 11、成品 3、细石器 31、石容器残片 1 件。F12 出土 559 件，其中砾石 63、废料 476、残缺品 6、成品 2、细石器 10、石容器残片 1 件。此外还有一座灰坑 H76 出土 1380 件，其中砾石 261、废料 1021、残缺品 16、废品 11、半成品 3、成品 10、细石器 53、石容器残片 5 件^[21]。足见北福地遗址本身功能具有强烈的石器加工专业化特征，因而石器贸易应当是北福地市场交易的主打产品，所以北福地遗址没有磁山遗址那样的粮仓遗迹，粮食交易不占主导地位，但是粮食有一般等价物的功能。

北福地遗址考古遗存商品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小商品经济特征是个体生产者手工劳动。从考古资料的角度看，就是家庭手工业。北福地一期房子内部废弃堆积里包含的石质品，显示出该村社的石器制造手工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商品生产。

北福地一期的房子总计 14 座，H76 也类似一座半地穴式房子的基坑，可视为房子。房子均为单间半地穴式建筑，面积在 10 平方米左右，显然是一个核心家庭居住单元。房子内或多或少出土石质品，与石器加工有关的石质品有砾石石料、废料、废品、半成品、成品，磨制加工工具砺石，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石碗属于房子主人使用的日用器具，不算在石器加工之列。细石器也可归入石器加工来考虑。根据如此分类，我将原报告相关的统计数据重新归类，制表如下。

单位	石料	废料	废品	半成品	成品	砺石	细石器
F1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F2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F3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F5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有
F6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F7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F8	有	有	无	无	无	有	无
F9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F10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F11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有
F12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F13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F15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F16	有	有	有	无	无	有	无
H76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表一 北福地一期房子堆积内石质品组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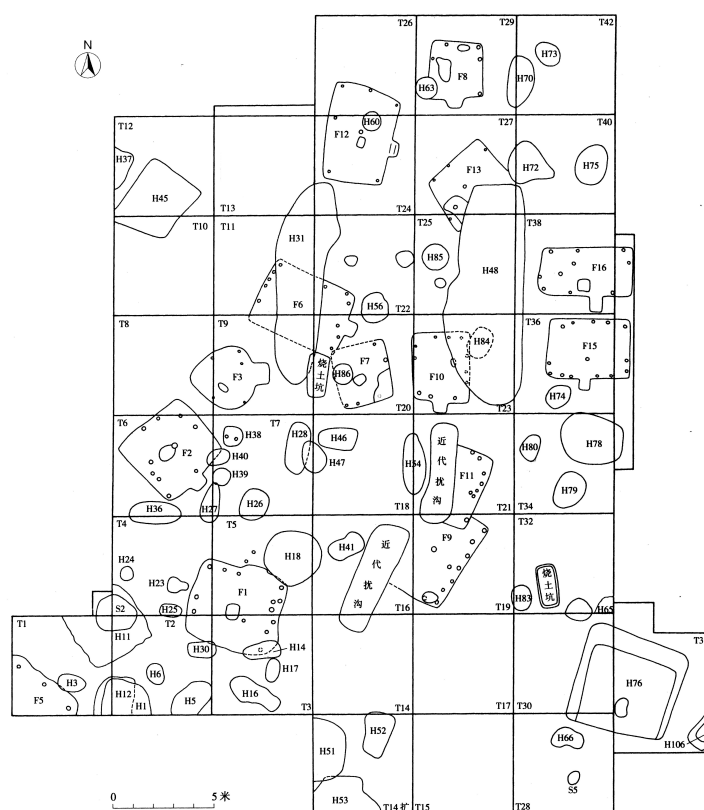
所有房子堆积都有石料与废料出土，出土石料-废料-废品或砺石组合者 F3，F5，F6，F7，F8，F9，F11，F16。出土石料-废料-废品或砺石-成品或半成品组合者 F1，F2，F12，

^[2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M].段宏振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99. 附表六（一）.

H76。同时生产细石器的家庭有 F1, F2, F3, F5, F6, F9, F11, F12, H76 (表一), 约占家庭总数的 60%。因此从总体上说, 北福地一期的房子资料可以反映当时家庭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小商品制造业的基本状况。

这些家庭石器制造手工业, 生产资料是家庭私有的, 生产者以家庭为单位属于个体生产者。其生产出来的石器作为商品拿到村北头的市场去贸易和销售。

从房子的空间布局来看, F1-F2-F3-F6-F7-F10-F11-F9 可以顺时针围成一个椭圆形的圈 (图十)。中央是一片小空场, 各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空场, 表明这一组房子所居住的核心家庭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家族。该家族的 F1, F2, F3, F6, F9, F11 核心家庭均生产细石器, 是北福地细石器生产的主要家族。



图十 北福地 I 区居址遗迹分布图

另一个家族可能由 F12-F8-F13-F16-F15-H76-F5- F4 构成, 围在 F1 家族房子的外围 (图十), 其中除了 F12、H76 和 F5 三个家庭生产细石器外, 其余五个家庭都不生产细石器。F12 家族不是生产细石器的主要家族。足见北福地 F1 和 F12 两个家族虽然都生产石器, 但是产品略有不同的侧重, F1 家族将细石器作为另一个主要产品来生产, F12 家族则不然。这意味着北福地一期的石器小商品生产, 尽管是家庭手工业, 但也不是放任各核心家庭随意组织生产, 而在家族层面上高一层次的生产组织管理。这个管理是家族内部式的, 很可能以宗法制度为依托, 不一定立刻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这种家族式的小商品生产的组织管理, 目的是有效地调节北福地石器产品进入市场后的合理份额, 以免各家庭无序生产与无序竞争造成家族内部或整个村社内部石器小商品生产的内耗和内伤。也就是说北福地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行业协会的协调管理作用,那么其家族对石器制造业的管理必然会从生产环节扩展到市场交换环节。北福地的考古例证很好地说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商品经济一开始可以由家族进行管理,虽然已经产生了家庭私有制,却不一定马上催生社会的不平等。

有趣的是,北福地一期石质品出土最丰富的遗迹单位中均出土石容器,这类文化因素与北方地区甚至中亚地区的石容器使用行为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另 F12 出土一件石质面具,该遗址其他单位出土的陶片面具与内蒙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面具非常接近^[22]。暗示北福地石器加工与贸易市场的主人究竟是谁耐人寻味。至少说明该市场具有边贸性质,是介于北方所谓的“沿长城地带”与黄河中游腹地之间的边贸市场。

段宏振先生认为北福地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史前时期的一条文化走廊,处于北方、中原、山东三个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在这条文化走廊内,北福地位于北端,磁山遗址位于南端^[23]。我认为这条文化走廊同样是商品贸易交流的孔道,所以磁山遗址和北福地遗址交易中心出现在这一走廊中,绝非偶然。

3. 杨官寨遗址分析

陕西高陵县杨官寨遗址是一处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的大型遗址,总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庙底沟文化时期有环壕,环壕内面积约 24.5 万平方米。2004 至 2008 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收获颇丰^[24]。

遗址环壕外南区是半坡四期的制陶工业园区,已清理陶窑 10、房子 23、灰坑(包括与制陶有关的坑) 496 个。南区部分灰坑出土大量完整陶器,如 H402 出土为数较多完整尖底瓶显然很可能是尖底瓶成品的储藏窖穴。南区还出土了一些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石球。发掘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业,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25]这一判断十分准确。

环壕内东北角也发掘出房子 1、陶窑 5、灰坑 68 个,可能是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制陶工业区。

最重要的发现是环壕的西门址及其两侧壕沟内的丰富遗存。门道是宽 2.7 米左右的生土过梁。过梁门道的南侧壕沟内堆积有七层,每层表界面上都有大量的完整器,被编号为 H776。同样的情况在过梁门道的南侧壕沟堆积内也存在,被编号为 G8-2。西门处壕沟口宽 11~13、底宽 4~6、深 4 米。沟底平坦规整。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辑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200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申报材料》中的遗迹图^[26],稍作空间分析。

H776⑦层表界面(即⑥层底界面)上完整遗物分布似乎以一个空白区域为中心,四周摆放器物 26 件,其中陶环 6、陶钵 3、夹砂罐 2、陶器盖 2、石环 2、陶灶 1、陶杯 1、陶刀 1、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 年的发掘[J].考古,2004(7).

^[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M].段宏振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63-264.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9(7).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9(7):9.

^[2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200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申报材料[G].西安,2008.

石器 1、磨石 1、陶饼（陶筹）3、石球（石算筹）2、石饼（石算筹）1 件。我认为这里是利用干沟的底部作为交易市场摊位，主要交易陶器和装饰品陶环或石环，所谓陶饼、石饼、石球凡 6 件，都是交易记账的算筹。

H776⑥层表界面上完整器物群空间分布大致可分出 2~3 个摊位。出土器物总计 49 件。其中陶钵 11、陶杯 7、陶罐 7、陶环 3、石环 2、石斧 2、彩陶钵 1、石刀 1、夹砂罐 1、平底瓶 1、彩陶盆 1、灶 1、盆 1、器盖 1、尖底瓶 1、漏斗（底）1、石球算筹 3、陶“纺轮”陶筹 1、陶球算筹 1、陶饼算筹 1 件。此界面上的摊位主要交易商品为陶器包括彩陶、石器、装饰品石环和陶环。纺轮、陶饼、石饼凡 6 件，也是记账算筹。部分陶罐是迷你模型器，也应是特定商品交易的记数工具。

H776⑤层表界面上完整器物群空间分布大致可分 3~4 个摊位。出土器物 41 件。其中陶钵 14、陶罐 9、陶杯 5、陶环 3、陶器座（陶鼓）2、陶刀 1、骨簪 1、平底瓶 1、陶盆 1、石球算筹 3、陶饼算筹 1 件。交易商品主要为陶器、装饰品陶环，石球、陶饼为算筹，凡 4 件。

H776④层表界面上完整器物群空间分布大致可分 4 个摊位。出土器物 120 件。其中陶罐 35、陶钵 32、陶杯 17、器座 5、彩陶盆 4、器盖 3、石环 3、陶环 3、平底瓶 2、陶瓶 2、陶刀 2、磨石 1、陶斧 1、陶釜 1、陶漏斗 1、单耳杯 1、石刀 1、陶灶 1、陶瓮 1、骨锥 1、骨簪 1、陶纺轮陶筹 1、石球算筹 1 件。主要交易商品为陶器包括彩陶盆和装饰品石环和陶环。纺轮与石球是算筹，凡 2 件。部分陶罐是小模型和不能实用的陶斧，应是特定商品的记数工具。

H776③层表界面上完整器物分布空间大致分为 2 个摊位。出土器物 66 件。其中陶钵 17、陶罐 10、陶杯 9、陶刀 4、陶环 4、彩陶盆 3、石磨盘 3、石环 2、陶盆 2、陶瓶 2、陶盂（量）2、磨石 1、陶釜 1、陶器 1、纺轮陶筹 4、石球算筹 1 件。交易商品为陶器包括彩陶盆、粮食（陶量、磨盘和磨石）、陶刀、装饰品陶环和石环。纺轮与石球为算筹，凡 5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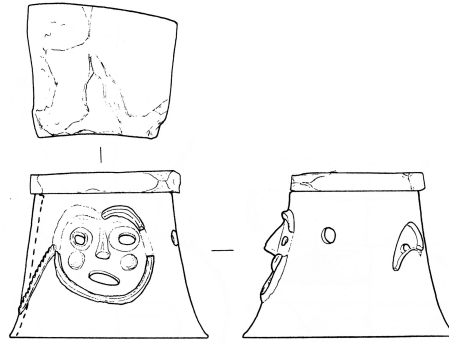
H776②层表界面上完整器物群分布空间大致可分 2~3 个摊位。出土器物 45 件。其中陶罐 13、陶杯 8、陶钵 7、陶环 2、陶盆 2、陶斧 2、陶器盖 3、陶碗 1、彩陶盆 1、尖底瓶 1、石球算筹 2、陶饼算筹 2、穿孔陶筹（或称纺轮）1 件。交易商品为陶器、装饰品陶环，陶斧代表特定的商品，陶饼、纺轮和石球为算筹，凡 5 件。

G8-2 堆积七层，未公布比较详细的资料，从照片上看也有完整器物群相对集中摆放，与 H776 相同。由 H776 可以推知，G8-2 也应是交易市场之一部分。这里出土的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图十一），可见于山西吉县沟堡遗址 F1 内^[27]（图十二），或许说明杨官寨的部分陶器至少可以播散到黄河东岸的吉县一带。

^[2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县沟堡遗址发掘简报[C]//三晋考古(第二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8-9.



图十一 杨官寨 G8-2 出土人面覆盆



图十二 沟堡 F1 出土人面覆盆

纵观杨官寨环壕西门市场商品交易以陶器为主，装饰品石环和陶环也占有较大比重，石器和粮食交易不占主要地位。陶器商品中以罐、杯、钵为拳头产品，而带有宗教礼仪色彩的陶器座（陶鼓）和彩陶盆，数量并不多。显然，杨官寨西门市场经营的商品以日用陶器为主，礼仪用陶器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杨官寨遗址周围，泾渭交汇地带，分布着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发掘者判定杨官寨是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28]。我认为这个中心聚落是建立在制陶和相关交易市场的小商品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初步形成于半坡四期文化时期，繁荣于庙底沟文化时期。

二、 相关问题的思考

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是以往我们学术界一直认为最缺乏的经济类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考古学家由于缺乏相关理论的指导，并长期局限于中国正史“重农抑商”的正统思想的苑囿，不善于从考古资料中辨别出商品经济和市场有关的遗存。本文选取了磁山遗址粮食为主要贸易中心、北福地遗址石器贸易中心、杨官寨遗址陶器贸易中心这三个案例，一方面表明在黄河流域史前中晚期，曾经存在过商品经济和贸易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中总结出商品经济的考古遗存标识（archaeological indicators），进而引导我们对黄河流域时期商品经济的社会历史地位，进行初步思考。

1. 商品生产的考古标识

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统称。从商品生产的角度说，小商品经济是私有制下专职化（full-time）个体劳动和专业化（specialized）家庭手工业。基于此，一旦我们发现考古遗存中，粮食储量、石器制造量、陶器制造量远远大于生产单位人员的自给自足所需量，这便意味着这些生产是商品经济。上述磁山的粟和石制品、北福地的石制品、杨官寨的陶器，显然不是仅仅满足本人、本家庭甚至本聚落的生活需求，更多的产品用于交换。

小商品经济生产，在基本生产单位里（通常是手工业家庭），产品是有侧重的，甚至是单一的。而在更高层次的生产组织里（通常是聚落即整个遗址），各基层生产单位的产品又构成比较完整的商品组合。比如北福地 F1 和 F12 为代表的两个家族虽然都生产石器，但细

^[2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高陵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 2009(7):9.

石器生产是 F1 家族的另一个主要产品，F12 家族则不然。而北福地遗址从总体上说生产石器和细石器。杨官寨遗址陶器制作大概在家庭生产的层面上，分别侧重小口尖底瓶、罐、器座（陶鼓）、彩陶、环等，如 H402 储藏了小口尖底瓶 22、罐 19、钵 16、盆 9、瓮 5、轮盘 1 件^[29]。可见 H402 的制作单位以生产尖底瓶、罐和钵为主，以盆和瓮为辅。而就整个交易中心来说，这些商品又构成了完整的产品组合。

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品种，很可能不是生产者自身生活必需品。比如北福地房子里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石碗，才属于房子主人使用的日用必需品，而大量的石制品是生产者的产品和生产工具如砺石等。杨官寨 H402 储藏的陶器产品远远超出一个家庭使用的需求。费曼指出，中美洲奥萨卡地区，不论是同一遗址还是不同遗址，家庭产品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每个家庭都使用不属于自己制造的产品^[30]。

2. 市场遗存的考古判断标识

西方学者对市场的考古判定标准有过一些探索，但除了考虑特殊结构的建筑和道路、台地和广场之外，似乎也没有找到更能指明市场性质的考古标志^[31]。绝大多数学者都像费曼那样认为，“从考古上确认市场非常困难”，所以费曼推测遗址外围的开阔地可能作为市场^[32]。我认为这一推测有一定道理，但可能不够全面。我试图通过磁山、北福地和杨官寨市场的考古遗存特征，提炼出一套“市场的考古判断标识”，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判别市场遗存。

（1）市场的空间——空场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所以市场首先需要一定的空间，通常以空场的形式出现。这可能是世界考古学家对于市场空间形态最直接的共识。磁山遗址卵石面遗迹以西的空场、北福地遗址高台上的空场、杨官寨环壕西门址两侧沟内空场等都是比较理想的场所。

（2）市场选址的可达性

芬利还提出，市场位置往往出现在半径 5~6 英里的交流聚会点上^[33]。这也可以通过宏观聚落形态的区域调查来进一步摸清情况，加以判断。从理论上说，市场地点的自然选择，一定考虑到参与贸易人员的步行可达性，半径 5~6 英里（约 8~10 公里）是比较适宜的可达性。

（3）市场交易的遗物

市场交易行为，造就了一些交易行为使用器物，包括记账工具如各种算筹、称重用器如量器和衡器、一般等价物甚至货币。磁山、北福地和杨官寨出土的“弹丸”、圆陶片、圆形穿孔陶片（或称纺轮）、模型小陶器均有可能是算筹。上述三个遗址出土物中尚无明确的衡器如天平和砝码，但是磁山和北福地出土的大陶孟，就是作为量器的陶量。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高陵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 2009(7): 7-8.

^[30] 加里·费曼, 方辉. 加里·费曼 (Gary M. Feinman) 教授访谈录[J]. 南方文物, 2013(4): 23.

^[31] Gary M. Feinman and Christopher P. Garraty. *Preindustrial Markets and Market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0, Vol.39. Pp.176~178.

^[32] 加里·费曼, 方辉. 加里·费曼 (Gary M. Feinman) 教授访谈录[J]. 南方文物, 2013(4): 24.

^[33] Finely, M. I., *Ancient Economy* [M] 2, updated with a new foreword by Ian Mor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5 [1993]:107.

费曼指出，阿兹特克帝国的特诺奇蒂特兰 Tenochtitlan/Tlatelolco 的大市场内交易，从不用货币，却有自己的特定等价物如可可豆和布匹^[34]。磁山、北福地和杨官寨可能都没有真正的符号化的货币，但粮食粟作为生存必需物资，比阿兹特克的可可豆更加重要，最有可能被当做一般等价物，陶量模型器，除了计算粮食粟交易流水账之外，还可充当粮食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实物立体符号。此外，纺织品也可作为一般等价物，于是纺轮即可作为纺织商品的交易记数工具，也可转化为象征纺织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实物立体符号。

市场上，交易摊位内会摆放一定数量的待售商品。所以市场内会发现成堆的相对完整的器物，既非墓葬随葬品，又非祭祀用的祭品或祭器。北福地和杨官寨市场内成堆摆放的完整器，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4) 市场与生产地共处同一聚落

黄河流域史前时期，商品生产与贸易，很可能都在同一个聚落，多数以“前店后场”的模式，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划。磁山遗址因为是粮食贸易为主，所以谷物加工与交易的市场空间上区分不明显。北福地石器加工在遗址东南部的居住区里，高台市场则设在遗址的西北部。杨官寨制陶工业园区集中在遗址的南部区域，而市场则设在西们通道两侧的干壕底。

3. 史前宗教礼仪用品能否成为商品

《礼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宗廟之器，不鬻於市。犧牲不鬻於市；戎器不鬻於市。”所以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宗教礼仪用器是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在专制政权统治下，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和文明，对于礼器的重视和出于重农抑商的意识形态，出台这样的限制礼器市场准入的政策是顺理成章的。商周有铭铜礼器表明，绝大多数礼器是自做、赏赐、馈赠甚至掠夺得到的，几乎没有靠商品交换得到的。因此，我们相信夏商周三朝，很可能实行的是“礼器不鬻”的政策。但是这不能说明中国史前时期和所有地区都实行“礼器不鬻”的政策。

因为在商品经济的话语体系中，任何符合供求关系的产品都有可能成为商品，并没有宗教礼仪用器和日用器作为商品的严格区别。就像近现代佛像、礼佛用品，都可以在专门的商铺或市场上买卖，只是换个名头，如“法物流通处”，“请佛像”等，避讳货币买卖表述而已。

杨官寨遗址生产的精美的彩陶、陶鼓（器座）、人面镂空覆盆器等，显然是宗教礼仪用品，却应当是交换商品的一部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福地遗址出土石质面具1件，陶面具175件，其中完整或可复原者10余件。绝大多数面具及其残片都出自房址堆积内或居住面上，少部分集中出土在三个灰坑里。其中F1出土面具残片占陶片总数10%。部分面具雕刻表现手法娴熟，是成人之作。有些雕刻技法稚嫩、简陋，似为学徒习作。因此段宏振先生认为，北福地的面具很可能是本聚落制作的用于宗教或巫术的特殊用品^[35]。我认为，北福地F1出土陶面具残块38块，显然超过了F1房主的个人与家庭需要，应当是F1生产单位所生产的商品之一种。此外F2出土陶面具1件，F11出土面具残块2件，F12出土陶猪面具1件。前文分析了，北福地F1-F2-F3-F6-F7-F10-F11-F9

^[34] 加里·费曼，方辉·加里·费曼（Gary M. Feinman）教授访谈录[J].南方文物,2013(4): 24.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M].段宏振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34-244.

所构成的遗址“中央”家族，出土或说制作面具的仅有三家：F1、F2、F11，占核心家庭总数的37.5%，出土面具包括残块48件（表二），其中以F1制造最多。

F12-F8-F13-F16-F15-H76-F5- F4构成的“外围”家族，共有8个单位出土面积包括残块，其中H78可能隶属于F15，H45隶属于F4，H52和H53不知隶属于具体哪个核心家庭，最后大致可以认为有5个家庭从事面具生产（表二），占该家族核心家庭总数的62.5%，出土面具数量为45件，其中H76出产最多11件。

归属	单位	数量	小计
F1 中央 家族	F2	8	48
	F1	38	
	F11	2	
F12 外围 家族	F12	10	45
	F15	1	
	H78	5	
	H76	15	
	H52	11	
	H53	1	
	F5	1	
	H45	1	
市场附近	H103	1	1

表二 北福地房址和灰坑出土面具统计表

从总体上说，北福地的两个家族均生产陶面具，两家的产量大致相当。但是“外围”家族从事面具生产的家庭更多一些，似乎是生产面具的主要家庭。而该家族却不是细石器生产的主要家庭。换句话说，F12外围家族是北福地聚落生产面具宗教用品的主要家族。

北福地面具不见于市场内，但在市场北侧的H103出土面具残块1件（表二），有可能是市场上也销售面具的间接证据。由此我认为北福地聚落生产的陶面具或石面具，应当也是一种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北福地玉器仅见于村北台地市场，现存的玉器为玦和匕，与兴隆洼文化玉器基本相同。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赤峰兴隆沟遗址曾出土过镂空人面头盖骨面具、石质和蚌质人面饰等^[36]，似乎在都在暗示兴隆洼文化与北福地遗址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商品贸易关系。

当然，宗教礼仪用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与日用商品有所不同，更加偏重精神文化的使用价值和社会身份等级的象征价值。宗教礼仪商品，在购买地被视为高端舶来品（*exotic goods*），用来标榜地位高的个人或家庭占有更多的与外界高层次交流（包括物资和信息）的渠道和资源，进而作为其在本聚落或村社里保有或获取支持者与较高地位的资本。中美洲奥萨卡Oaxaca谷地San José（三卓西）期（1100~800年），通过一系列的礼仪和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 年的发掘[J].考古,2004(7).

舶来品流通来建立起远程交流和交换的网络^[37]。远程交换的礼仪用品和交换物资包括磁石镜、深海贝、鱼、黄貂鱼翅、鲨鱼牙和低地龟壳^[38]。

4. 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是否普遍存在

目前我虽然举出了磁山、北福地和杨官寨三处黄河流域史前中晚期的商品经济例证，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更多的同时期遗址尚缺乏明确的商品经济特征。因而我们尚无法做出史前中晚期黄河流域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结论。我们也还无法判定上述三个市场贸易中心是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市场网络的典型代表，还是仅仅是镶嵌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自发市场孤岛。如果通过今后更加深入的考古研究，表明后一种情况，那么黄河流域史前中晚期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经济模式。河南灵宝西坡庙底沟文化中心聚落的考古资料^[39]，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特征，似乎支持后一种推测。

5. 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对社会复杂化的贡献如何

从理论上说，并非商品经济一出现，便立即催生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北福地和杨官寨的商品生产组织、市场经营管理的职能，可能掌握在家族层面，仍可以在平等的社会秩序中有效管理。按照其惯性发展，可能难以自行进入到分层社会。

从中美洲奥萨卡谷地的考古例证来看，不同的家庭小商品黑曜石器生产组合不同，表明每个家庭有着自己对外贸易的渠道。而掌握更多对外贸易高端渠道的家庭，更容易在本村社获得较高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可以通过长途贸易获得更多神圣宗教用品如黄金、珍珠、纺织品、放血黑曜石匕首的个人和家庭，更容易成为首领（chiefs）^[40]。

与中美洲奥萨卡谷地相反，黄河流域史前中晚期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营管理权力把持在家族的手中，剥夺了各核心家庭自主寻找买家的权利，单个家庭是难以独自获得自己的对外贸易高端渠道，家族可以在内部进行公平的利润分成，一时杜绝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温床的滋生，于是磁山、北福地、杨官寨遗址尚处于平等的部落社会。

三、 余论

四、

黄河流域史前晚期自杨官寨遗址之后，商业贸易中心聚落以及商品经济遗存似乎销声匿迹，至少不再像磁山、北福地和杨官寨遗址这样凸显。初步看来，其一可能是因为黄河流域史前时期，商品经济从未占有主导地位，在史前晚期便被彻底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

^[37] Gary M. Feinman. *Demography, Surplus, and Inequality: Early Political Formations in Highland Mesoamerica*[C]//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Ed. by Timothy Ear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245.

^[38] Drennan, Robert D. and Kent V. Flannery. *The Growth of Site Hierarchies in the Valley of Oaxaca: Part II* [C]// *The Cloud People: Divergent Evolution of the Zapotec and Mixtec Civilizations*. Ed. By K. V. Flannery and J. Marcus, New York: Academy Press, 1983:49.

^[39]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1(11):3-14.

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 2001 年春季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2(2):31-52.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M].文物出版社, 2010.

^[40] Gary M. Feinman. *Demography, Surplus, and Inequality: Early Political Formations in Highland Mesoamerica*[C]//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Ed. by Timothy Ear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1-252.

其二可能是因为黄河流域史前中晚期的商品经济孤岛,可以带来某个氏族部落和家族的集体财富,但由于家族或部落的集体管理体制,无法催生聚落内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化,这就意味着社会只能裹足不前,无法复杂化。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是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因此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必然选择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王权(monarchy)政治化的道路,最终形成中原的王权专制政治模式和文明起源模式。

格里宁曾经提出早期国家有民主制和君主制两种体制^[41]。我进一步认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王权政治与建立在小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与生俱来,早至前国家阶段。两种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各自的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明争暗斗,也从未休止过。黄河流域专制王权政治中“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正统思想,就是对商品经济及其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抑制,自夏商周三代进入王朝国家时代以降,一直是回旋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的主旋律。

黄河流域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进入社会复杂化阶段,以灵宝西坡墓地玉钺和象牙器为代表的高端舶来品(exotic goods)可能确实对社会等级化有帮助,但有可能是通过“上层交流网”^[42]获得的。这个“上层交流网”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交流网络,而是以玉器、象牙器等高端无日用价值的宗教礼仪舶来品为载体,在地区间交流思想观念、信息的网络,并不以谋取商业利润为目的。因此,可以说黄河流域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归功于“上层交流网”,而不依赖于民间的、世俗的商品贸易网。

(原文刊于《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1月。此处转载略有修改)。

^[41] Leonid Grinin. *Early State and Democracy*[C]// *The Early State: 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 Volgograd: 'Uchite' Publishing House, 2004: 428.

^[42] 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J].东南文化,2004(3):66-72.